

新锐作家小说评析

不经意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同我们擦肩而过了。上个世纪末，呈全方位联动的文学态势，曾让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充满期待。汉语文学总体未来格局中意义和价值的凸显，曾经是我们坚持的信念。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中国经济潮流的来势迅猛，特新的变化，作家与写手越来越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文学仍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学的余温，延续了当代文学的发纯文学的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终极价值迷失，陷入困境。纯文学的执着追求者和读者都感到不心休。新路，是一些作家正在严肃思考，在文学的十字路口，基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纯文学的坚守，一些作家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在文学的十字路口，文学突围的路径，而同时，在《山花》上毅然开设了，并迅速得到了作家们的出版社同仁一起策划编书，只是为准确起见，我特典，守望先锋，把脉，感觉，把脉，四个关键词。

80后作家可谓生不逢时，文坛引领风骚，后有80后学期刊的推动下，80后竟成了一个尴尬的话题，作品的大面积覆盖，并保持了他们大都有自知之明，仍缺乏新的突破，鲜有代表活跃活跃的学院批评家关注的后作家队伍不相匹配，因循活语或传统批评模式，而对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市场的合谋，导致了文学的溃败，他们，禀赋，天赋，力等方面的，以具代际差异拉开文学道路和纯文学的创作，其影响势必波及到一代文学新人，80后的真正崛起，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当务之急，是对80后文学创作态势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并对其进行有价值的创作个案进行透视和剖析，围绕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开掘新的可能性和前景，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8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这位作家创作总体性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

把脉70后

何锐◎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九十年代末，呈全方位联动的文学态势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业的最新发展，文学的勃然兴起，文坛格局发生了质的泛化，虽然新世纪十年的文坛，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对新精神的匮乏使文学再度如何突围，才能辟出一条新路。

《山花》栏目设计时，我有意识地新世纪文学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我们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探寻文学的下一代作家，80后，因而我主编，聚焦80后，这四个栏目，主编，遂接受友人建议，与竟受到上述栏目创意的启迪，书各卷命名依次为：回应经典，触动灵魂结构，回应，守望，感，从而组合成了文学突围的作家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在改变其处境和命运，在一些文坛和影响，以致后来人们谈论80后有实绩的创作群体，文学期刊中的中坚和主力，难能可贵的是，因是多方面的，目前比较，关注度不够，目前比较，处置办法，布不成阵，与80后，批评的错位或失，与80后，不惜对80后热炒，自然成为空挡，媒体和，正丞上后下的一代，在纯文学，或关联，而其文学，出，他们的成长经历，文学道路和纯文学的创作，其影响势必波及到一代文学新人，80后的真正崛起，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当务之急，是对80后文学创作态势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并对其进行有价值的创作个案进行透视和剖析，围绕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开掘新的可能性和前景，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8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这位作家创作总体性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

新锐作家小说评析

把脉70后

何锐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脉 70 后: 新锐作家小说评析 / 何锐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9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ISBN 978-7-5399-3905-6

I. ①把… II. ①何… III. ①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6886 号

书 名 把脉 70 后: 新锐作家小说评析

主 编 何 锐

责任编辑 二 木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05-6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何 锐

不经意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同我们擦肩而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呈全方位跃动的文学态势,曾让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曙光满怀期待。汉语文学总体水平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未来格局中意义和价值的凸显,曾经是我们坚执的信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业的最新发展、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市场经济潮汛的来势迅猛,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勃然兴起,文坛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家与写手越来越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文学从边缘化走向了泛化。虽然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仍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水准,延续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纯文学的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终极价值迷失,媚俗成为时尚,创新精神的匮乏使文学再度陷入困境,纯文学的执着追求者和坚守者不能不心怀忧虑。新世纪文学该如何突围,才能辟出一条新路,是一些作家正在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课题。

基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纯文学自身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去年着手《山花》栏目设计时,我有意识地同一些作家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就文学自身的反省达成了共识:新世纪文学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典意识、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的匮乏,这就启示我们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而同时,还要毫不迟疑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70后,因而我在《山花》上毅然开设了“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这四个栏目,并迅速得到了作家们的积极回应,今年,我因退休不再担任《山花》主编,遂接受友人建议,与出版社同仁一起策划编书事宜。没想到这套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的缘起,竟受到上述栏目创意的启迪。只是为准确起见,我特意将原有的栏目名稍作了变动,故而这套丛书各卷命名依次为:“回应经典”、

“守望先锋”、“感觉城市”、“把脉 70 后”。四个书名,四组动宾结构,“回应”、“守望”、“感觉”、“把脉”都指向特定对象,具有一种动态感和方向感,从而组合成了文学突围的四个关键词。

关于“回应经典”

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又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始终处于文学版图的核心位置。不言而喻,经典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极具禀赋的作家才有资格入乎其内,但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以经典作为参照或借鉴,使自己的创作与之具有某种相关性或千丝万缕的联系。坚持经典的价值取向是提升文学品质的必要条件,也是纯文学存在的理由。当然,经典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这个时代真正的经典还来不及产生,也可能文学经典已具雏形,但尚未被公众所体认,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经典作出回应,自不待言,作家们是会有自知之明的,他们深知经典可遇而不可求。经典总是凤毛麟角的,但对经典的回应却可以千姿百态。不容置疑,回应经典是一种姿态,其中不乏对经典的诉求。而对经典的天才回应有时就可能造就另一部经典。回应经典本身要求作家必须具备经典意识,经典是作家审美意识、生命理想和他所置身其中的生存世界高度融合的产物,它对心灵境况的领悟、对人的处境的探索、对生存世界的批判都是具有深度的,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心灵和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和复杂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经典正是向我们昭示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一方面专注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另一方面又潜心于小说技巧、文体风格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这就注定了经典的非同寻常,一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这便是经典的艺术魅力所在,这也是我们何以要回应经典的缘由。本卷收入当初由我组稿并责编的 21 位出生五六十年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每位作家一个精彩短篇,一篇关于经典的随笔,因小说了解作家的创作水平,由随笔感知作家对经典的领悟。

关于“守望先锋”

先锋文学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大多数人避而不谈,但私下却常为人所企盼和关注。我仍坚持认为,先锋性不过是文学性所延伸的属性,文学性和先锋性是密不可分的,回避先锋性谈文学性,意味着创造精神的匮乏,而离开文学性的先锋性只能是伪先锋性,是对时尚的追逐和媚俗。先锋是媚俗的天敌,它也羞于与时尚为伍,它命定是一种孤独的存在,先锋文学常常表现为对文学性的某种偏执和强调。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抑或先锋性,不仅是一种写作姿态,更是严肃的精神立场,既包括文体层面的变革,更涵盖精神向度上的探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人类生存的诗意呈现,这种语言艺术与图像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具有审美内视性特征。内视性想象始终与内在体验和情感倾向如影随形,它创造的内视化世界是一种想象的世界和虚构的现实,理所当然的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正是这种虚构性和内在精神特质成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它植根于作家的审美感悟力、想象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不断拓展文学特有的审美疆域。基于文学自身的审美要求,无论独具禀赋的神性写作、智性写作或灵性写作都需要寻求新的表达,采用独特的表述方式,并且离不开对生命本身的追问和思考,对精神指向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的专注,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执着于这种内在不确定性的表达,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所衍生的存在的可能性维度的把握,才是文学或小说的真正奥秘所在。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理解先锋性,有利于破除先锋性的神秘感,使人们意识到,作家对生命体验的超常性表达,对生存哲学的非常规思考,对小说叙事和艺术形式的探索,对文学自主性和文本观念的强调,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创作主体对文学现存秩序的一种反叛倾向和变革冲动,以及在叙述姿态和策略上的必要调整,意在实现文本形式和思想内涵的双重超越。因而,我以为应视先锋写作为常态写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世纪以来先锋写作一直没有终止,不仅仍有文坛宿将在孤寂中坚守,文坛新锐也并未对前卫或先锋弃之如敝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散落于网络和民间的先锋,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另类写作者。本卷主要收入五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十余位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山花》上发表的具有先锋特质的中短篇小说。尽管难免瑕瑜互见,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实绩。

关于“感觉城市”

较之乡村叙事,都市书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作家都市意识和城市书写经验的双重匮乏,无疑给写作增加了难度,但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给城市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向都市书写的广度和深度掘进,是拓展小说视野,促进文学观念变革的需要,它既可以促进小说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又有助于深化文学现代性的主题。城市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景观,随着城市边界的延伸和扩展、城市文化符码的翻新、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演变、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农民工的大量涌入、社会两极分化的明显加剧,给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城市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城市的生命图景和生存脉动,是人类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表征,而同时,城市物欲的巨大诱惑,又是导致人异化的根源。城市文明和城市原罪的连体共生性是由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要着力揭示城市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呈现当下城市的巨大包容性,同时不能无视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依存和关联,这是当今中国文学城市书写中的重点和难点。本卷收入了二十余位作家城市题材的小说,其中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生活,但切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真实,因而也有让其入选的理由,这二十来篇小说涉猎白领、小资、市民、知识分子、农民工,以及北漂各色人等的多元生存和城市生活的多种景观,集中展示城市的魅力和诱惑,体认城市精神和伦理,表现城市生活的心灵和情感历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城市表象背后人性扭曲和物欲膨胀的真相,发现一个异己而陌生的世界。尽管入选作品在都市景观的呈示,城市书写氛围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些作品较多触及城市边缘和表层,诉诸感觉却意味不足,偏于写实而想象乏力,对人性深度的揭示显得捉襟见肘。但我们对中国文学城市书写的新的转机仍充满期待,毕竟我国城市文学尚处于起

步阶段,重要的是作家首先要勇于接纳城市,全方位的去感知城市,进而培养并扩展对城市的感受,用心灵去触摸城市,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城市社会中社会、心理、价值的种种嬗变。

关于“把脉 70 后”

70 后作家可谓生不逢时,刚好处于时代夹缝之中,前有五六十年代作家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在文坛引领风骚,后有 80 后作家受市场青睐,行情看涨,声势逼人。为改变其处境和命运,在一些文学期刊的推动下,70 后先后经历过两次崛起,但仍未争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后来人们谈论 70 后竟成了一个尴尬的话题。而实际上,70 后是当今文坛最活跃、且颇有实绩的创作群体,文学期刊中作品的大面积覆盖,并保持一定的水准,足以表明他们是纯文学阵地的中坚和主力,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大都有自知之明,不浮躁、也不自卑,导致 70 后大器晚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们创作仍缺乏新的突破,鲜有代表性作品,特别是有影响的长篇力作。二是批评的关注度不够,目前比较活跃的学院批评家关注的重心多为功成名就者,与之相对应的 70 后批评家势单力薄,布不成阵,与 70 后作家队伍不相匹配。因而我们更多看到,对 70 后的创作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置办法,或用主流话语或传统批评模式,轻易加以贬斥;或以“后现代”尺度进行价值判断,导致了批评的错位或失位。三是市场与媒体的双重疏离,市场受商业驱动,热衷于青春写作和时尚写作,不惜对 80 后热炒,而对坚守纯文学阵地的 70 后显得冷漠。媒体更多看重名家,关注主流,70 后自然成为空挡。媒体和市场的合谋,导致了对 70 后不应有的遮蔽。有必要指出,70 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在纯文学的谱系中,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作家一脉相承,彼此的创作有着血缘上的亲近或关联。而其文学禀赋、颖悟力等方面的凸显优势,虽以其代际差异拉开了与 80 后的距离,但由于他们的成长经历、文学道路和纯文学的创作实绩,其影响势必波及到一代文学新人。70 后的真正崛起,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当务之急,是对 70 后文学创作态势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并对其有价值的创作个案进行透视和

剖析,围绕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认真把脉,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同时发现他们独具的禀赋和潜质,开掘新的可能性和前景。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这代作家创作总体性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收论文多半曾刊在《山花》“聚焦70后”栏目中,有几篇则是我早先的约稿,但由于我的离任,该栏目自然终止,这些约稿只好发在另外的刊物上。在此一并收入,算是作个纪念。另外,征得作者同意,我还特意选入批评家洪治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一文,意在通过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给70后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系,以利进一步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和方向。

这套文学丛书是由贵烟冠名的,贵烟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简称,贵烟本身又是一个知名品牌。十年前为回报贵州烟草业对纯文学的支持,并彰显黄果树品牌的影响力(黄果树集团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的前身),我曾主编过一套以黄果树冠名的书系。十卷本的书系中收录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花》杂志上的优秀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烟工业公司品牌重心转向“贵烟”,而“贵烟”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品牌,对其重新打造和提升,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贵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身份或档次,“贵烟”的华丽转身,别具一种象征意味。以之来冠名这套文学突围书系,是恰切不过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贵州中烟工业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我谨向贵州中烟工业公司全体员工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具有文学眼光的企业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作家朋友们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同仁,正是他们的睿智和对纯文学的信念,才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目 录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何 锐(1)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

-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 梁 鸿(1)

可疑的“个人”

-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阅读札记 周立民(17)

-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 贺绍俊(36)

在逃脱处落网

- 论 70 后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 张 莉(44)

缝隙中的呓语

- 论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群的当代都市书写

- 洪治纲(57)

- 70 后女性作家都市书写述评 李 慧(70)

- 70 后作家叙事话语特质论析 傅元峰(80)

重建我们的精神立场

- 简单的写作或魏微小说的问题与可能 何言宏(94)

- 李师江城市叙事的魅力及写作转型的得失 谢 刚(110)

从“寓言”到“传奇”

——致乔叶 郜元宝(125)

“病孩子”徐则臣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 翟业军(139)

浪漫的陷落与挣扎

——论棉棉的《糖》及其他 李丹梦(149)

探险与冒险

——李浩小说论 崔庆蕾 吴义勤(162)

鲁敏论

——兼说七十年代作家群 晓 华 汪 政(176)

游牧者的诗意

——70后作家于晓威小说论 陈晓明 刘 伟(189)

“这一个”青春黑暗又明亮

——读冯唐 张 莉(201)

“彼此”世界里的化骨绵掌

——论金仁顺的短篇小说 张学昕 梁 海(213)

鲜花与囚笼

——是70后,也是“新生代” 李修文(223)

70后的写作及可能性之一

——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节录) 徐则臣(231)

量子文学:一个70后写作者的文学观 黄孝阳(237)

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 洪治纲(250)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

梁 鸿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在当代文学景观中留下的第一个身影虽然鲜明，却并不那么“光彩”，卫慧、棉棉的“欲望化写作”、另类的个人行为及其“恶俗”的文学炒作方式几乎成为消费文学与都市“恶之花”的代表，而她们“流星”式的文学生涯似乎也证明她们的文学观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都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出场”留下阴影。但不管文学史如何评价“身体写作”，棉棉的《糖》和卫慧的小说具有一种无法被忽略的异质性和代表新的可能性的美学因子。在这之后的十年中，逐渐步入中年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却集体“沉默”，活跃在文坛上的大部分作家，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如前辈作家莫言、贾平凹或李洱、毕飞宇那样能够以个人修辞建构起属于自我的精神风格。或许，他们身上具备的新的特质与倾向并不被挑剔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感知，也因此对他们的作品总会有忽略与误解。但是，毫无疑问，这与作家自身主体性的模糊、文学观的偏差和世界观的限度有很大关系。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与文化问题，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创作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多层次分化，与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当代文学发展趋向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也值得探究。

身体写作与新都市意象

从整体层面考察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一定不能绕过卫慧、棉棉及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坛上“红透”文坛半边天的“美女作家”们。关于她们，批评界已经说了很多，笔者并不准备在这篇文章中仔细论述，而把分析重点放在之后更为普遍化、常态化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们，但是，后者与她

们之间又有着谱系学上的联系,这也使得对一些本质的关系与影响进行简单梳理很有必要。

关于卫慧、棉棉“身体写作”的场域,最典型的的就是陈思和先生的一个判断,“这些‘问题孩子’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正是这十多年来致富阶层形成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精神空白与欲望泛滥所造成的。在她们生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正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追逐、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渲染成为全民族追求象征。”“致富阶层形成过程”也就是新都市的形成过程,这一“新都市”被模糊了其新型意识形态性的存在,而成为个人、金钱与新的自由的象征地,它以其张扬、感性、时尚、现代滋生着新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卫慧、棉棉无疑是最早触摸到新都市脉搏的作家,她们的成长、自我塑造、生活方式及其问题是“都市”的雏形与缩小版,与“都市”的内在形象是同构的,是资本化与中产化时代来临的预告。身体的躁动与不安正是“都市”的躁动与不安,“都市”以“身体”伪装自己,并悍然出场,它不是理性的产物,正如新感觉派笔下的旧上海一样,它以直接的生理刺激为特征,是速度的,眩晕的,让人厌恶,同时又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但是,作家本人并不认同这一归结,他们更强调“身体写作”所具有的个人性与美学意义。当有人说棉棉是“欲望化写作”或“都市写作”时,棉棉非常气愤地回答道,“我想这‘身体性’指的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用感性把握理性”,这可以说是新的美学宣言,它所意味的不仅是语言风格的变化,而是书写领域、书写方式及文学价值起点的变化。棉棉的《糖》以“身体”的乌托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挣扎在爱与痛之间的问题少年形象,让人震惊的不是作品主人无法抵抗的吸毒与欲望,而是那有着无穷疼痛的身体,它那么单薄瘦弱,却又那么渴望爱与抚摸,它的精神是如此的与生理紧密相连,这是之前的中国小说所没有的。除了卫慧、棉棉、周洁茹的创作之外,尹丽川、丁天、冯唐等都是典型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写作。尹丽川以尖锐、略带点思辨的诗歌或小说叙事把青春的身体躁动与成长之间的关系给刻画出来,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陈家桥的《南京爱情》等则有一种喧嚣的、性感的、混乱的美感与叙事的张力。

他们的文字往往能激起一种越轨的特殊快感，他们对人性禁地、文明暧昧处的深入探索与大胆书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

回顾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可以说，由卫慧、棉棉所引起的身体写作思潮是最有力量，最值得思辨的文学事件与文化事件。这些小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既来自于个人心灵的焦躁与紧张，也来自现代社会给其的挤压与诱惑，它是一种病症的征兆，揭示了这个时代的内在情绪，有着很强的文学隐喻性。传统的道德体系无法装置后殖民语境下新的欲望，无法回答新都市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千奇百怪的种种问题。“身体”以其本体形象进入了文学，进入新都市生活，它成为一种政治学，以具有冲击力的美学形象揭开了沉默在中国文化深层的肉体，同时，也以其与新型消费文化极其暧昧的关系而进入到都市生活的内部逻辑。它含有青春文学的特点，却比“青春”的边界更大。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为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叙事空间。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开路先锋的存在，虽然历史、文学的发展会最终抛弃它们。

当然，这是就纯粹意义而言。棉棉的宣言及身体写作具有这样的革命性和美学超越性，但这只是可能。当这一形式与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后殖民”背景及新的传播方式纠缠在一起时，意义就显得芜杂，并且常常改变原有的方向。从身体写作实际发展的脉络来看，从卫慧、棉棉到周洁茹、金仁顺们，再到新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木子美的性爱创作，具有复杂意义的身体已经被简化为肉体，欲望被描述为性，自由与个性成了滥交的保护伞，“欲望化写作”取代了“身体写作”，成为当代文学上最富暴力色彩的写作美学，“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当“深刻的不安”变为一种文化、阶层的炫耀与消费的资本，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启蒙意义、革命性也被消费社会所吸收。“身体写作”这种“意义值缩小”的倾向表达了七十年代出生作家摆脱道德、秩序、历史，强化自我存在的强烈愿望，但也恰恰由于此，“身体”开始变得苍白。当所有的反叛，颤动，黑暗及丰饶都变为理所当然并且沾沾自喜的展示，它的先锋性、启发性也即丧失，因为缺失了思辨与矛盾，也就没有了探索与追问的可能。

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与木子美等人的性爱书写，与之后网上过于

低俗的性描写的泛滥，三者之间是在什么意义上具有关联性，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否则，“身体写作”将永远被这一堕落的“果实”压抑并且无法翻身。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体写作”的被否定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叙事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身体革命是二十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政治革命，而女性主义书写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支脉。从王安忆的“三恋”，到陈染、林白的“身体叙事”，女性在不断寻找进入历史语境的途径，卫慧、棉棉从身体本体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欲望的存在及与社会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会是新的探索的开始，但是，当这些被过分放大并且以另一种形象出现时，其对女性历史存在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从个人化叙事，到下半身、欲望化，再到“性爱日记”，身体叙事一步步远离了意义与女性存在，而变成了庸俗社会学的符号象征。

小城镇叙事

与卫慧、棉棉笔下那流光溢彩、金属味极浓的都市意象和强烈的感性特征所不同的是，稍后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如戴来、鲁敏、金仁顺、张楚、乔叶、葛水平、田耳、徐则臣、李浩等人，他们笔下所书写的大多是小城景象与小城人生，那种尖锐、富于冲击力的文学质感也变身为温柔敦厚、平和冲淡，即使偶有“逸出”，也只是无伤大雅的点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具意味的现象。这一现象并不是因为作家对“名声败坏”的“身体写作”的回避，而是作家生存场域、写作场域与美学体验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些作品有一种小城镇意味和小城镇美学特征。我以为，目前为止，这一美学风格才是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常态与基本样态。这样的说法会产生某些疏漏，但依此，却能够说明一些深层的问题。

随着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社会组织结构也在渐变，小城镇逐渐崛起、壮大并发挥重要作用，所谓的乡村城市化，其实是乡村城镇化。这样的内陆小城和小镇，普通、庸常、相对封闭，它既不是乡村，但又存留着乡土社会的某些特征，譬如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仍然是一个泛化的乡村形态；同时，它与大都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卫慧、棉棉们所感受到的“纸醉金迷”和强烈的消费欲望，在小城镇中还只是某种暗示与

渐变,对小城生活与心灵并不具备强大的震撼力。正是处于这样历史时期的小城镇与城镇生活哺育了新一代作家,当前活跃在文坛上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们大多出生在中国内陆的小城镇。在平静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房屋前面的那条小巷,那条通过学校的街道、小河,和散落在历史角落的各个普通的家庭和普通的人生,而感知外部世界的方法最多也是通过“喇叭裤”、“三毛”、“琼瑶”、“迪斯科”等局部的事物。可以这么说,当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如醉如痴地吸收学习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时,还只是少年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则如醉如痴地阅读来自于港台的琼瑶、三毛、金庸,并沉湎于一种自我营造的感伤和对传奇的向往之中。

对于“历史”、“社会”这两大名词,七十年代生人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家人的闲谈,哪怕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并不遥远的“大跃进”、“文革”、“三中全会”、“联产责任制”等等,在他们那里,也只类似于传奇,与他们的童年、少年的生活与情感都无关。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初步完善,七十年代生人在系统的教育中完成自己的学业,没有任何“节外生枝”。他们被大历史遗忘,也由于最后一代多子女家庭而被父母遗忘,他们循规蹈矩,是父母的乖孩子。由于寂寞,他们敏感于自我心灵的触动,忧郁、内向,自我咀嚼的能力特别强。因此,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难以产生如五十年代出生作家那样的土地意识与大地情怀,也没有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与历史之间尖锐而深远的冲突与知识分子情怀。他们无法接触到现代政治与历史最为核心的精神部分,也无法感受到拥有大地的那种厚重与深沉。他们“生活在别处”,所经历的、能够自动成为写作资源的只是朴素、普通、平淡的小城镇的日常生活,面目模糊的、乏味的、很难进入历史话语系统的那一部分人类存在。

“请设想有这么一座城市,它在中国,它在此时,它不是一座辉煌的大城,它是中国上千个平庸的中小城市中的一座,由于不大,还不曾狂热地超出自己,所以它比较真实——‘真实’的意思是它没有那种梦幻色彩,它和它的过去还保持着联系,比如对历史、乡村的记忆;它是灰色的、暗淡的、沉闷的,所以它总是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或惊吓。——这个城市是戴来的,是她写出来的城市。”与上海、北京或一些大型的、现代的城

市相比,“这个城市”或许用“小城”来称谓更为恰当。小城,不像都市的庞大与冰冷,生活在其中的人有一种家园之感,因此有爱与宽容,其中的变化也多以“世道人心”来衡量,而它的破败本身也为叙事和回忆增加了温馨的成分。戴来的大部分小说如《亮了一下》、《别敲门,我不在》等都有“小城”的意象,虽然多是失败的人物与人生,有点残酷的意味,但却与“小城”的乏味、平淡相一致;魏微为《大老郑的女人》、《尖叫》加了一个“小城系列”的副题,作者对小城的移风易俗、道德秩序都有极为准确的把握;张楚的小说如《大象》、《刹那记》等大多书写“镇上”的小人物如何艰难生存并最终相濡以沫,除了对社会不公平做委婉的讽刺外,也蕴含着对传统道德观的致敬;徐则臣通过一个敏感、内向的少年塑造“花街”上的人生;鲁敏在《思无邪》、《纸醉》中会说“我们东坝”怎样怎样,因为在鲁敏那里,作为小镇的“东坝”像家一样,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有情感,“东坝”,是作者心中的社会形象和生命形象。

对小城镇日常生活与人性进行想象与建构成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鲜明的美学特征。在缓慢、略有些黏稠的语言流动中,作品中的人物似乎生活在某个亲切而又朴素的小城,无奈而又惯常地与家人、友人、爱人重复着一天天的生活。作家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家庭,亲情的看重,在这里,人性是克制的、日常的,情节的设置也非常节制,一切都点到为止,没有声嘶力竭,没有奇怪而肤浅的巧合,没有宏观的政治隐喻,只有时间在慢慢流动,生活呈现出简单而复杂的形态,一切都耐人寻味,最终,故事在辛酸、感动、谅解或宽容的温暖中结束,正如有论者评论张楚的作品,“他的书写特点在于他作为叙述人的耐心,他会不厌其烦地书写日常中的细部生活,直到它们闪现出我们平素不易察觉的亮度。”正因为如此,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练就了卓越的对细部事物的表达能力与叙事能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力量,因为他们生活的历史语境就是琐碎的、日常的。他们对人性、生活的微妙之处领会的格外深刻,对个人生活内在情感与内在情绪的体味有极强的表达能力,这些往往成为小说的闪光点。作家也特别重视自己的这一能力。

他们的叙述对象多是普通的、无特征的小城人,不具备现实主义中的那种典型性性格或现代主义的符号化性格,是毫无特殊之处的小人物